

全球化下
中西
文化的交流

回顧與前瞻

美國西東大學

梁伯華 教授

Edwin Pak-wah Leung



Modernizing China, Globalizing the Worl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全球化下中西文化的交流： 回顧與前瞻

**Modernizing China, Globalizing the Worl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梁伯華
Edwin Pak-wah Leung**

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全球化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回顧與前瞻

Modernizing China, Globalizing the Worl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作 者：梁伯華

編 輯：黃雁鴻

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第一版

印 數：600冊

ISBN 978-99937-58-61-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作者簡介	5
自序	7
全球化下中西文化整合的反思	9
西學東漸：容闥的“西學”與中國的現代化	15
粵籍“留美幼童”與中西文化的交流	27
中外學者對“留美幼童”研究的成果	37
中西文化的異同：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政體的論戰	47
中西文化的碰撞：與郭穎頤教授的對話	59
西化與現代化：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傾向	69
中西思想的衝擊對《南京暴行》作者張純如的影響	75
中西學術的結晶：徐中約教授的生平與史學成就	91
華人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發展：個人經驗談	99
搭建二十一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103
成功之道：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成功學大師對華人的啟示	107
 附錄	
梁伯華教授和他的“中國情結”（江嵐）	117
東學西漸，緣份天成：訪2007年愛麗絲島移民榮譽獎獲得者梁伯華教授(鄒興睿)	125
梁伯華教授中英文著作目錄	131



作者簡介

梁伯華教授，原籍廣東南海，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即獲中文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的交換計劃選派赴美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美國西東大學至今。歷任多所中美著名學府的訪問教授，包括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及香港大學等，並為武漢大學客座教授。

梁教授現任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著作豐富，享有國際性的學術地位。著書二十多本，為近代中國研究的權威，研究範圍涵蓋外交、政治、商業、歷史、文化等，興趣十分多樣化。屢獲“專業成就優異獎”、“學術著作優異獎”及“愛麗絲島榮譽獎”等，並出任多個學術及專業團體的顧問職位。

梁伯華教授學貫中西，除發表學術專著外，並經常為報刊專欄撰寫散文及隨筆，抒發他對東西文化的沖擊與融合的觀察和感受，並引用實例生動地描述，及以豐富的知識和深刻的哲理，與廣大讀者共享；更撰寫勵志書籍，勉勵年輕的一代努力向上。

自序

二十一世紀是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資訊與高新科技猛速發展，加速了人類與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日新月異的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下不斷的劇變，人類的思維與行為亦不斷在深層變化，不同文化的交流，催化了全人類思想的互動。

本書出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探索這個全球化浪潮下中西文化交流與結合的新方向及中華文化發展的新道路。筆者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從事及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在海外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希望能藉此增進中外不同民族及文化之間的相互認識和了解，從而化解不必要的誤會和衝突。

回顧過去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矛盾與衝突頻繁。這段時期的歷史，中國被西方列強侵略，西力與西學的東漸，使本來一個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帝國似乎突然間變得無力招架，潰不成軍。但是，再深層的看，這段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更是中華民族在外力衝擊下努力掙扎與自強的奮鬥史。中國如何加入現代世界，也就是如何從西方世界吸取新的文化元素與經驗，來開展出新的道路，向前發展及邁進。今天，中國的崛起，象徵著一個古老文明在海內外龍的傳人不斷的努力下再出發、再壯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從“西學東漸”到“東學西傳”，這種壯闊波瀾的文化交叉互動，實在是令人十分的振奮！

本書的書名為《全球化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回顧與前瞻》。書內的文章，有“宏觀性”的分析，也有“微觀性”的探索，有“回顧性”的歷史點滴，也有“前瞻性”的個人看法。部分文章曾在一些學術期刊及雜誌刊登

過，也一併收集在本書內，以豐富書中的內容。

本書的出版，得到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及圖書館館長林子予博士的大力支持，特此鳴謝。此外，筆者在該校的中西文化研究所作客訪問期間，得到該所不少幫助，亦一併致謝。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發源地，在歷史上佔有一席很重要及有意義的地位，因此本書能在澳門出版，既是一個歷史的巧合，也是筆者在澳門作學術訪問期間所留下的一點記錄，不啻是一個永恆的留念，是為序。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
講座教授及系主任

梁伯華博士

二〇〇八年二月

於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全球化下中西文化整合的反思

（一）引言

在全球的人口中，華人已佔了總數的五分之一，除了13億居住在中國境內的華人外，散居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華人，也是不可勝數的。炎黃子孫，龍的傳人，都在海外開花結果，延綿不斷，而隨著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後，中國的人口起碼在統計上又多了650萬。

這樣龐大的數字，單從量的角度而言便已是十分驚人。試想想：全球每天有多少人在使用中文（無論是用中國的哪一種方言）？很明顯，中文是全球應用得最多的語言，遠遠超過其他的所謂國際語言，無怪乎在聯合國，中文是主要的官方語言之一，而全球興起的中文（漢語）熱，也使所有的華人在全球的距離拉得愈來愈近了。

（二）中國人傳統的“世界觀”

其實，在很久以前，中國人就已是著眼世界了。

但是，傳統中國的“世界觀”，卻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朝型模世界觀”，也就是說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天朝”，中國的帝王自稱“天子”，獲“天命”來君臨“天下”，以這樣的一個心態來放眼世界，自然是自視甚高，把自己定位得遠遠超乎其他國家及民族之上。

固然，歷史上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而相當強大的國家，但把自己的優越感強化起來，相信也很難以平等的態度及地位來對待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國家了，特別是當“天朝”利用它的權力來要求其他國家朝貢及臣服中國時。這個“天朝型模世界觀”，實實在在地在歷史上延續了不知多少年代，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後，才開始出現改變。

這個“天朝型模世界觀”的形成，當然與歷史上中國的國富力強有著很大的關係，但是，也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與悠久的文化息息相關。

數年前才逝世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編輯了一本名為《中國的世界秩序》的專書，討論到這個“天朝型模世界觀”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基本上還是以中國文化的接受程度作為分野。除了“天朝”的中國外，在這個世界秩序的另一個層次所以名為“漢化區”，就是因為其中的國家接受了較多的中國文化，漢化較深，例如朝鮮、日本及越南等國。其他亞洲地區的國家則屬“內亞洲區”，在不同的程度上也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遠遠不及“漢化區”的國家，而處於世界秩序外圍的國家還屬“外亞洲區”，包括不接受中國文化的西方“蠻夷”諸國。

不論你接不接受費正清的觀點，中國歷史上文化的凝聚力與優越感對“世界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深化了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在近代歷史上面對著工業化了的西方文化的衝擊，顯得手忙腳亂，更在數次的挑戰中潰不成軍，不得不開始重新來看西方的世界。

（三）西學東漸與中國對世界的認識

西學東漸，是近中國認識“新世界”所無可避免的過程。

中國那強化了的文化優越感，又如何能接受西方文化呢？就算是要接受，究竟要接受哪一方面的西方文化？答案應是如何，倒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當然，西學東漸與留學潮又有著很大的關係，而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也經過了不同階段的歷程。

提倡西學的鼻祖，首推“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闕。容氏早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便一心一意將西學傳到中國去，並通過留學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在他的提倡下，中國的首批留美幼童遠道取經，開啟了留學的熱潮。

誠然，容闕在中國現代化的路途上，有開拓的功勞，但是，深一層看，容闕所提倡的西學，卻是一個“全盤西化論”，完全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這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真是匪夷所思。這比五四運動時期的“全盤西化

論”，更是早了半個世紀！

容闈的“西體西學論”與當時改革派所倡導的“中體西學論”自是大相徑庭，因此士大夫對容闈的攻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固然，部分保守的士大夫是固步自封，對新的世界毫無認識（亦不屑認識），因而加深了中國對外的排斥。但是，容闈對中國文化及價值的排斥，一心一意地尊崇西學，將中國“全盤西化”，這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行上，都存在著極大的疑問：究竟中國在這個新的世界上應該如何定位？傳統的、高高在上的、夜郎自大的心態固不足取，但是處處排斥自我、貶抑中國文化的方法更無法使中國在這個新的世界上找尋到新的位置，反而以西方世界馬首是瞻，所造成的問題，相信與固步自封所留下的問題不相上下。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一直是這百多年來中國近代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但也沒有忘記加進他所認同的中國傳統制度與理念。留學熱潮一波一波，從留美的，留日的，到留蘇的，有識之士都沒有忘記：在西學的衝擊之下，究竟應該如何將中國在現代的世界中重新定位。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也是深切地關聯着悠久的中國歷史與深厚的文化遺產，我們沒必要作衛道之士，但更沒必要將文化遺產來個“大拍賣”。若完全脫離了形成中國人的文化，則華人又如何能自處？難道真只是“黃皮膚、黑頭髮”就是華人嗎？最重要的，難道不是要有一個敬重中國文化的心嗎？

敬重，並不是指要盲目地排外。向西方學習，要擇優而處，重新將中國在新的世界裡定位，現今世界瞬息萬變，閉關政策只能使中國與世界的鴻溝變得愈來愈大，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誤解。“冷戰”時代使中國與世界隔離了頗長的時間，因此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新的契機。

（四）“冷戰”後的“文明大戰”

東西方“冷戰”結束，是否又開啟了世界文明論爭的大戰？

這個有點危言聳聽的說法，原來是出自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亨廷頓在近幾年來，致力於發揚這個“文明衝突論”，並曾出版多篇論文及專著來闡釋。在1999年6月號的

Civilization 期刊上亦有專文。

所謂“文明衝突論”，是指在冷戰結束後，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正在聯合起來，並對西方的價值、利益與權力構成日益嚴重的挑戰，因此“冷戰”後的世界格局，將不再是超級強權間的敵對形態，而是變成不同文明的衝突鬥爭。

亨廷頓更進一步認為，美國應聯合同屬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國家，遏制並打擊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以及以中東各國為代表的伊斯蘭教文明，他建議以這種“異教威脅論”來作為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基礎。

“文明衝突論”一出，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強烈的迴響與廣泛的批評。

整體來說，“文明衝突論”缺乏信服性，因此附和者少，反對者多。被亨氏所稱的“儒教”的中國，會不會與伊期蘭各國結合成反對西方“異教大聯盟”？相信認識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人士心目中會有一個答案。

亨廷頓的說法是否別具用心，實在是值得探討。無論如何，印象是“嘩眾取寵”，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是“閉門造車”的一個學術產物，而又愈來愈不為學術界所接受。

散播在全球的炎黃子孫，代表着儒教文化在海內外的延綿，面對着這個類似學術分析但骨子裡卻是相當反華的言論，其侮辱性猶如感同身受。以中國為首的“儒教文明”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了“擴張性”、“攻擊性”的異端邪說，把中國文化與極端的民族主義掛鉤，把《中國可以說不》的書說成是這些言論的證據，凡此種種的說法，都不會被廣大的華人所接受。

（五）中國威脅論

深入一層來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或多或少是在替一些政客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作了理論上的張本，利用文化的上不同，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冠以有“威脅”性之名而實行對中國“圍堵”。

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突然清除了一個長久的敵人，“冷戰”結束，一些政客及智囊團又忙於努力“創造”一個代替蘇聯的新敵人，而“中國威脅論”就在這個背景及環境之下產生。

在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際，美國擔心（或甚是害怕）在亞洲有強國崛

起，挑戰美國在太平洋的壟斷地位，而強大起來的中國自然而然地成了在政策上一個假想的敵人。

在國際政治上，國與國之間的抗衡本來並不足以大驚小怪，但是美國在“圍堵”中國的過程中，卻將美日聯盟提升，把經濟富強的日本也拉進這個防衛的構想中。事實上1997年的最新及修改過美日聯盟，給予日本更多在軍事上的擴張及權力，這對日本的鄰近諸國而言，將會引起無比的不安，這些不安當然是與近代史息息相關的。

日本在近代史上的軍事擴張，使亞洲人民在當時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慘痛經歷，猶如歷歷在目，日本鄰近諸國的人民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迫廢除軍備，以防止軍國主義的再興，但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美日聯盟的名義及美國的扶助下，日本會不會再度變成軍事強國，及再度威脅鄰國的安全？目前日本的軍事預算十分龐大，美國會不會因為“圍堵”中國而引狼入室，使日本勢力坐大而導致以後不可收拾？這實在是全球華人十分關心的問題。

事實上，目前中日之間仍存在着領土的糾紛，釣魚島主權的論爭，使海內外華人的民族情緒高昂，“保釣”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過末期此起彼伏，因為全球華人都關心着中國領土的完整。

（六）香港回歸與華人的全球意識

當然，1997年全球華人注意力的焦點，就是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香港割讓給英國，是鴉片戰爭慘敗後中國的屈辱，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終於結束，香港回歸祖國，一掃歷史上的國恥，使舉世的華人為之歡欣不已。

使海內外華人歡欣的，除了香港的主權回歸外，同樣重要的是香港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享受着高度的自治，五十年不變，以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中國統一的問題。

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代表着中國政府在政策運用上的靈活性及彈性，以謀求解決在歷史、文化、政治及經濟上的種種問題。

這個政策上的靈活性及彈性，也標誌着中國面對着現代的世界及轉變的環境能夠靈活定位，在民族原則、國際政治、歷史發展以及經濟現代化的種

種因素支配下，走出一條屬於中國自我的道路。

誠如不少學者專家所預言：21世紀是亞洲及太平洋的世紀，換句話說，世界發展的重心，在不久的將來，又將回到這個佔有全世界60%人口的亞洲區，而中國將會是這個“亞洲世紀”的龍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發展的舞台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香港、台灣，以至在海外的華人，對於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新的發展，也作了很大的貢獻。事實上，一個“大中華經濟圈”（容納祖國大陸、港、台以及海外華人）不斷地擴展，以無比的活力，為中國的現在及將來締造新的發展契機，其前景是無可限量的。

香港的回歸，結束了西方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也帶給了全球華人無比的振奮及新的期望，祖國的統一，又成功地跨進了一大步，一百多年的列強侵凌及割地賠款，是全球華人內心的歷史憂傷情結，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束，該是中國人吐氣揚眉的時候了。21世紀的中國，不再是屈辱及軟弱的古老大帝國，也許，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世界觀，又將會重新展現在國際舞台上。

（七）結語

中國的發展，與全球的華人息息相關。而華人放眼世界，也是以中國作為他們視野的焦點。

從古到今，歷史的巨輪永遠在不斷地轉動。傳統中國的“天朝型模世界觀”在歷史的巨輪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在新的世界裏，新的挑戰下，新的環境中，中國要重新在世界的秩序中定位。要向西方學習，也要保存自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開啟新的路向。

道路是人走出來的，華人所認同的中國文化，並不是一個具有威脅性及欺凌性的文化，“文明衝突論”及“中國威脅論”的產生，反使海內外的華人更加清楚自己文化的本質及自我，進而對祖國產生更大的認同。

在21世紀裡，隨著中國的統一及發展而在亞洲地區及世界上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世紀”，成為全球華人心目中一直盼望能早日到來的明天。

西學東漸：容閔的“西學”與中國的現代化

（一）容閔與中國的大變局

容閔的一生（1828-1912）正是處於中國的大變局，一方面傳統的儒家價值由於西力的衝擊而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而另一方面，由於環境的需要，中國卻又不得不從西方世界吸取新的知識及技術，以圖奮發自強。

容閔由於自幼即受教育於教會學校，亦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成為中國第一個在美國的大學畢業生，而畢業後即回中國參與洋務運動的推展，故其事功向為史家所樂道，容閔亦一向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的開路先鋒”，啟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然而，容氏的西學思想及辦理洋務的態度，則鮮為人知，即有編著述及，亦是語焉不詳，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文試圖從容閔受學經過、西學對他思想的衝擊、及他發表過的言論及著述來分析他的西學思想，從而評論他的“全盤西化論”及徹底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

本文亦試圖從容氏西學思想的角度來衡量及評價他辦理洋務的態度及方法，特別是他督促“留美幼童”學業時任內的表現。本文利用一些在美國發現的有關“留美幼童”的原始資料，重新對容氏辦理洋務的態度及方法作全面的評價。

中國在現代化的起步時，容閔在當時所提出的“西方模式”思想，雖然是很革命性及在當時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它的價值取向及所朝的道路卻是大有商榷的餘地，容閔要以“西學”作為中國發展的目標，但對大部分知識份子及當政者來說，“西學”只能作為一種自強的手段，而不是目標，因此容閔的不為重用，實植根於他的“西學”思想。

（二）容閔求學經過及西學思想的形成

容閔求學的經過，在他的於1909年出版的英文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中譯本改名為《西學東漸記》）¹有很生動及詳細的描述。而美國的兩位學者湯瑪士·勒法格（Thomas La Fargue）²及愛曼德·威菲（Edmund Worthy, Jr）³亦有敘及。

從各種資料顯示，容閔接受傳統中國教育的機會差不多是絕無僅有，這很可能是影響他毫無選擇性地接受“西學”的原因之一（他的中文程度十分低，亦無中文作品流傳），另一原因，則可能是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及他在少年時代所看見中國落後的一面，從而被西方的“優越文化”所深深吸引而導致排斥中國傳統文化。

容閔，字純甫，生於1828年（道光八年）11月17日⁴，雙親務農，家中生活相當困苦，更遑論能提供容閔予一個紮實的傳統儒家教育。加上他們家位於離澳門只有四里的南屏鄉（廣東香山縣），受對外貿易及西方思想的影響，村民對“西方老番”的猜忌，早已大為減除。⁵

在這種環境之下，容閔的父母，由於希望兒子能學習洋文，以便能在外國人的商行謀一差事，所以在他七歲的時候便送他到澳門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在家中所辦的學校就讀。⁶由於容閔在班中年紀最幼，深得郭夫人的喜愛，也因此而使容閔對她敬慕不已。在郭夫人諄諄善導之下，容閔開始了學習西方知識的第一課。

但影響容閔一生最深的一個外國人卻是一位從美國來華及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牧師森美·勃朗（Rev. Samuel R. Brown）。勃朗牧師在1839年出生任剛在澳門成立的馬禮遜學校校長。馬禮遜學校的成立，是當時的廣州外僑

¹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1909)。中譯本名為《西學東漸記》，由徐鳳石、惲鐵樵合譯，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校訂重印。日文版則由百瀨弘翻譯，阪野正高解說，于1969年東京出版。

²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WA.:1942)此書有中文譯本，由高岩翻譯，書名改為《中國幼童留美史》，於1980年由香港文藝書屋出版。

³ “Yung Wing in America”，*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XIV.3(1965)，p.p. 265-288。

⁴ 有關容閔的生卒年月日問題，可參考高宗魯《有關容閔的史料問題》，載《傳記文學》第36卷第3期（1980年3月），第111至116頁。

⁵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下作《自傳》）第一章：幼稚時代。

⁶ 同上。